



二〇一四年五月，戴逸先生在审改《清史》书稿。

(上接第二版)

1959年9月，吴晗发表《论海瑞》《海瑞骂皇帝》。1961年，又奉命创作京剧《海瑞罢官》。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刊发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按例，此类文章发表前应报请中宣部同意，但此次中宣部领导多方查询仍不清楚该文如何发表、为何发表。

一时间，学术界对封建社会有无“清官”和“清官”的历史作用展开了广泛讨论。尽管语辞激烈，仍属学术争鸣。但姚文将学术纷争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横加挞伐，指责称“《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从而引起舆论哗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中宣部在惊兀之中召集龚育之、邢贲思、戴逸、林甘泉组成写作班子，以“方求”为笔名，于同年12月29日在《人民日报》刊发了题为《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的文章，目的是为学术争论“把舵”，力求以史为据、以理服人。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取自戴逸1964年以“星宇”为笔名发表的《论“清官”》一文。

形势的发展出乎众人意料之外。不久，“文革”爆发，中宣部被批为“阎王殿”，戴逸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的黑爪牙”、“吴晗的马前卒”等帽子，遭到游街、批斗、抄家。年方四十的戴逸身心俱伤，灰头土脸。

戴逸被红卫兵抄了三次家，所幸红卫兵将抄家的目光盯住多年积累的笔记本、资料卡片、文件及与友人的来往信函和各种手稿，其目的主要是搜查他与周扬、吴晗“沆瀣一气”的“罪证”。至于个人藏书，虽属搜查范围，但与“罪证”相比，尚非重点。

戴逸的内心虽然痛苦，但当他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到家中，看到围拢上来的夫人和孩子们关切的目光与问候，心中顿增温暖。

每每坐到书桌前，他总会不由自主地拿起书来。那段时间，他看得最多的是那套卷帙厚重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多时就沉浸其间、万事俱忘。

1971年初，戴逸夫妇与其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

“牛鬼蛇神”等一起被逐出京城，至江西余江“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和批判，住房归还给学校。

望着那重负在身的书架，那桌上、床头、地板上所堆放的各种书籍，带无法带、寄无处寄，万般无奈，只能痛下决心，除挑拣几本自己可随身携带的，其余全部交废品站处理。重达两吨的几千册书，自己省吃俭用买的、友人送的，如今只能凄然一别，心灰耿耿……

半个世纪之后，以戴逸当年读书笔记编辑而成的《经史札记》在他九十寿辰时正式出版，戴逸在自序中写道：“披阅数页，日前被严厉批斗之苦，顿时消退。此后日与此书相伴，在挨批斗、作检讨、罚劳动及囚禁牛棚之后，即读此书自慰，聊作解忧忘危之计。后又延读诸子《资治通鉴》《史记》等书，并作札记。存稿既多，积累成帙，唯三次抄家与下放‘五七干校’时散佚尚多。当时戏作一联：‘读书只为解忧计，著文却成阶下囚。’”

### “清史是我的专业，我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

戴逸因酷爱史学而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从此走上了漫长的史学研究之路。他研究过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抗日战争史，最终与清史结下不解之缘。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董必武副主席就提议要编纂两部史著，一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一是清史。由于当时新中国成立未几、百废待举，经济建设任务十分繁重，编纂工作只能延迟。

1959年，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开始筹划清史编修工程，又因三年经济困难而再次滞缓。

由于戴逸是“中国历史小丛书”七人编委中最年轻的一位，其才华学识与认真工作的精神颇得吴晗赏识，所以吴晗在制订工作方案和组建写作班子时不但想到了戴逸，还倾听他的意见。当时，戴逸才三十多岁。

1965年秋，根据中央要求，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召开部长会议，对启动清史编修工作规划作了专题研究，会议确定，由七位专

家组成清史编纂委员会，戴逸又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会议还决定，由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作为编修清史的专门工作机构。

不幸的是，几个月后，“文革”风暴横扫中国大地，专家委员会成员相继受到冲击迫害，酝酿已久的“清史”工程横遭夭折。

直到“文革”结束，编纂清史一事再度提上议事日程。第一件事便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由戴逸任所长。在他的建议与主持下，花费七年时间出版了两卷本共七十万字的《简明清史》。这是清政府消亡七十多年后出版的首部清史专著。

虽然这是一次小范围的实践尝试，但在戴逸看来，其意义非凡，因为培养了人才，同时积累经验，凝聚共识。他既要对得起那些力主编修清史已先后离世的前贤哲人，同时，这也是时代之期盼。编修清史，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更重要的是，他要将清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定下来。

为了保证《简明清史》的质量，戴逸每天阅读大量文献资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求真务实的治史精神，严肃对待，设计框架，理清脉络。他力求“辨三百年兴盛衰亡之变，书新时代警世资政之史”。

在数十年治学治史的繁重工作中，戴逸先后推出《中国近现代史稿》《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简明清史》《乾隆帝及其时代》《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五部代表作。其中，《简明清史》被史学界誉为国内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比较系统、全面地研究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历史的专著，被国家教委指定

为大学文科教材，并被评为全国优秀教材。

他还写下了八百余篇学术论文。其中，绝大多数文章环绕清史研究这一主题，凡清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人物、社会、疆域……均在他的视野之中。

时光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盛世修志”已成普遍共识，从中央到地方，编史修志成为一项党政领导下全面启动、认真规划、系统部署、精酿细作的文化工程。

或许清史工程的学术成分过于精深、规模过于宏大，必须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更多的时间才能做好浩繁巨细的各项准备工作。因此，清史工程一度停留在“积极关注并筹划”的状态。

1982年，戴逸为此写下《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一文，呼吁：“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已灭亡七十年”，“我们非常需要有一部观点正确、实事求是、叙述详尽、条理清楚、材料充实、采择精审、规模宏富的大型《清史》。应该力求提高质量，努力使这部著作能够如实地反映清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成为三百年来的知识总汇和生活的镜子”，“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发扬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发展社会主义的学术，编写大型《清史》的任务，势在必行。”

2001年4月，戴逸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代盛事旷世巨

佳时机》，“希望政府、社会、学术界共同关注此事，使此巨大的文化工程得以及时启动和顺利展开。”拳拳之心，溢于言表。文章一经刊发，就得到了社科界的热切响应，也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2002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亲自听取了戴逸的建议，并当场拍板。同年12月1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戴逸被任命为主任。

期待已久的《清史》编纂工程终于拉开帷幕。自此至今，花落花开，又是十四个春秋过去了，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的戴逸先生，始终“常怀临渊履冰之惕”，殚精竭虑，运筹帷幄。

在他统率下，全国三千多位专家教授为了同一个目标，齐心协力、献智献策。如今，一百卷共三千多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已进入终审阶段。与之配套的清史文献工程也成果卓然，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档案丛刊》《文献丛刊》《研究丛刊》《编译丛刊》《图录丛刊》《清史译丛》等，将散布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的珍贵文献，荟萃一堂，洋洋大观。而年高九秩的戴逸先生，至今仍每天坚持花六七个小时审读各部史稿，为心中的清史梦孜孜不倦，焚膏沥血。

“清史是我的专业，我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



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戴逸先生在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上致获奖辞。



2015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戴逸与清史研究”学术座谈会。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右）与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新诺（左）向戴逸先生敬花致贺。

典——关于大型清史的编纂》，文章指出：“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综合国力增强，加之研究队伍壮大，学术积累丰厚，编纂大型清史已是最

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字里行间，闪耀着戴逸先生理想的光芒，也透露出信念的力量。用春秋之笔挥写的清史人生，已成为戴逸先生毕生的巍峨巨著，高山仰止，泽被后人。